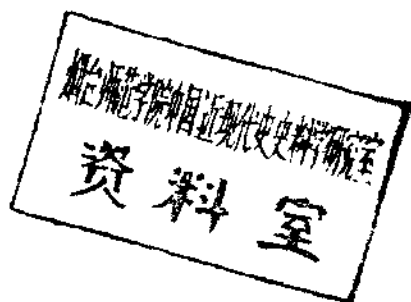


无极文史资料选辑



政协无极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前 言

《无极文史资料选辑》在第一、二辑问世之后，现在第三辑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本辑征稿期间，曾召开了三老座谈会，承蒙老同志大力支持，寄来文章十多篇，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未能全部付梓。兹选定侧重史料方面的作品五篇：

一是，《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曲凯歌》。歌颂了抗战初期我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正确、伟大和胜利。一是，《民间剪纸艺人杨素苗》。她是一位热爱剪纸艺术的民间艺人，今年已七十有九，仍坚持创作。其作品曾作为中日友好的纽带之一，深为国际友人所赏识。一是，《“七七”事变前无极县的教育概况》。反映了自清末建校以来直到“七七”事变前的教育概况。较详细地列举了小学校点的数量以及学生的名额，从中可以看出我县教育的发展概况。一是，《无极县工商联会史话》。历叙了我县工商联会的创始与发展。一是，《无极县曾建包拯祠缘由初探》。这篇短文，试图澄清建拯祠的原委，以及民间传说无极曾称“定远”的乏据。可惜掌握的史料不足，对建包祠的原因仅有传说，未见史乘，但对定远非无极则可以肯定。至于建包祠原委，犹待继续考证，初探仅属一篇抛引之作。

由于时间仓促以及我们的思想、知识水平所限，在内容、文字和编排上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崔永明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曲凯歌	
.....赵国才	(1)
民间剪纸艺人——杨素苗	杨德普 (5)
“七七”事变前无极县的教育概况	
.....陈承德	(8)
无极县工商联会史话	刘宗诚 (13)
无极曾建包拯祠缘由初探	
.....连克明 康英奎	(18)

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曲凯歌

赵 国 才

席造火，号洛统，无极县泗水乡王村人。席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有四十口人，耕地五百亩，骡子十条，大车三辆，房屋七十余间。常年雇佣长工十二名，家里有劳动能力的人平时也参加劳动。另外，席家还与别人合夥经营“玉兴隆”钱铺一处，有资金三万元，其中席家占股金二千元。

为了进一步扩大产业，一九三五年，席洛统和子侄们商定在天津开一个轧花店。围绕这个计划，自己的土地每年种棉百余亩。所产棉花一斤不售，全部积存，为经营花店打下基础。他家在天津开轧花厂的计划得到其它股东的赞同，所以，在一九三六年秋季又合夥购买了一部分棉花，共计积存棉花十一万斤。另外，席家还积存下花生油二百四十桶，计一万二千斤，原想和棉花一同运到天津。由于“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出现兵荒马乱的局面，席家去天津开花店的设想成为泡影，这些重要物资都存放在席洛统的家里。

在大汉奸翟二狗的勾引下，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冬季占领了无极县城，从而我县二十多万人民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为了镇压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力量，自一九三九年秋天，敌伪更是不断出城，疯狂扫荡，烧杀淫掠，惨绝人寰。

同时，敌人还千方百计掠夺重要战略物资，尤其是对棉花，更是见了就抢，甚至破被套也在掠夺之列。在这样的情况下，席洛统对积存的棉花欲售无门，欲存又怕被敌人白白抢去，因而终日惶恐不安。

这时我党为了动员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抗战，驱逐日寇，提出了“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的全民总动员的抗日口号，出现了群情激愤，同仇敌忾的抗日局面。我抗日区政府知道了席洛统积存大量棉油这件事，认为王村离敌人占据的县城，只不过十华里，是处在当时敌人的所谓“爱护村”范围内，这些棉油随时都有被敌人发觉、抢走的危险。一九三九年秋季，有一天，区长李维夫同志找到我，进一步核实了席洛统积存棉油的情况，并且知道了我和席家有亲属关系，就提出让我放下其它事务，从速去作动员席洛统献出棉油的工作，并且严肃地指出：“这不仅是对财物的动员，而且是关联着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壮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一定要掌握政策，不要强迫。这个工作做好了，对这一带村庄其他有产阶级积极参加抗战会发生重大影响。”我接受这个任务以后，第二天就到王村去，找到席洛统及其次子席泽普等人座谈，依仗亲属关系，讲了我党的抗战政策和形势，还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情感和在民族危亡之际，应当挺身救国的牺牲精神。谈话中，逐步提到席家的存棉问题。大道理讲清以后，我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你们这些棉油，保存是不容易的，与其被敌人抢去，就不如献给政府，充实抗日力量，和广大工农群众共同携手，一道抗日。”这样述之以理，晓之以利害，席洛统边听边沉思，最后终于答

应把全部棉油捐献给出来，并且主动承担做说服其它股东的思想工作。

事情有了眉目，我带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区政府向李区长作了汇报，得到了李区长的热情赞扬，并指示我抓紧时机，一气呵成。当时天气淫雨连绵，木刀沟已经决口，漫地是水，无法行动。两天后，水势稍退，我踩着没膝的深水，徒步十里，再到王村，和席洛统见面以后，又找到其它棉油股东席瞎碰等人商量，着重讲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他们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贡献一份力量的民族爱国主义情绪！同时进一步说明了这部分棉油献给抗日政府的作用和被日寇抢去的危害性。在那个时代，对那些有产者，除了割肉疼，恐怕就是捨财疼了。所以，这些人起初一声不吭，陷入沉思，怎么处理，心里十分矛盾。在大家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还是席洛统先说了话：“日本侵略，困难当头，生命朝夕不保，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应当把这些棉油献给国家，也算我们为抗日尽了一份力量。这些东西要卖卖不了，要用，我们各家又不缺吃少穿，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存放一天，担一天风险，一旦被日军发现抢去，我们不仅丢了财产，实质上等于资助了敌人，既对不住国家，也无颜见父老乡亲。”席洛统的一席话，深深触及到大家痛处。在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席洛统这个开明乡绅带动下，激发了其他股东的抗日救国热情，纷纷表示同意将棉油全部献给抗日政府，事成之后，我区政府动员了十三、四个村的上千名群众，组成一支行动迅速、纪律严明的运输大军，每人一条扁担二个包袱，既迅速又隐蔽地把席家存放的十一万斤棉花和一万二千斤花

生油，在四、五天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从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运走了。在抗日政府筹建不久，经济财力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这些物资确实解决了很大问题。事后，席洛统的次子席泽普和另一个主要股东席瞎碰，为逃避敌人追捕，在抗日根据地躲藏了几个月，态度非常坚定。鉴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机，席家虽属富户，但能深明大义，献财抗日，区党委批准接受席泽普和席瞎碰二人为中共党员，席泽普还被委任为晋深极县五区财政助理员。1940年闹宪政时期，席洛统还被晋深极县选为县议员。他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抗日战争环境日渐残酷的一九四一年，除让自己的长孙席中道继续担任抗日小学教员以外，并动员正在中学读书的另一个儿子席中哲参加了八路军。其子后来在军队中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一九四四年光荣牺牲。区小队在王村活动时，总是吃住在席家；席家也总是热情照料。席家成了富户中不多见的抗日革命家庭。事隔四十多年，回想起来，动员席洛统献出重要抗日物资，确实是抗日爱国民族统一战线胜利的一曲凯歌，是团结各界人士合作抗日的典范。

赵国才，无极县大陈乡泊头村人。1915年在本县乡师毕业，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本村支部书记，先后担任过小学教员，中心校长，高小校长，民校总校长，党校理论教员，现已离休。

民间剪纸艺人——杨素苗

杨德普

杨素苗，无极县甄村乡正村人，1908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是著名的喉科医生，且擅长书法；父、兄都是私塾先生，对书法、绘画很有造诣；祖母和母亲善于刺绣。幼年的杨素苗，聪明好学，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七岁即随父、兄学习绘画，八岁开始跟母亲学刺绣，十二岁开始学剪纸。她心灵手巧，一接触剪纸艺术，就一心扑在剪纸上，潜心钻研，不仅富有摹仿性，而且富有创造性。平时注意观察家禽家畜以及花鸟鱼虫的形态；因而，她的作品形象生动，造型优美，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惹人喜爱。逢年过节或男婚女嫁，邻里乡亲都喜欢求她剪些“福、禄、祯、祥”之类的吉祥花样，装饰门庭、房间。因而，作品遍及四乡，深为邻里乡亲所喜爱，所称赞。

她的剪纸技艺，别出心裁，自成一家，只用一把剪刀剪制，不用刀具加工，或其它工具刻切，作品线条细而不乱，粗而不拙，独具风格。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的发展，思想的开朗及对艺术的追求，她的剪纸作品，除花鸟虫鱼人物之外，还有表现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五十年代她剪得“五谷丰登”及“大白菜”“大南瓜”等艺术作品，曾选送省展览馆展出，深受省美术界的好评。

正当她的作品走向社会，跨上省美术艺坛的时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期间，杨素苗保留下来的刺绣、剪纸作品遭到了厄运，被当“四旧”抄出焚毁，数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工具被没收，人也横遭批判，致使她伤心落泪，曾发誓不再剪纸刺绣了。当有人求她时，总是摇头叹惜，婉言谢绝，从此她陷入沉默、悲哀、惋惜的情绪中，悲怜自己几十年的艺术作品毁于一旦，惋惜自己数十年的艺技不能发挥，真是欲剪不能，欲罢不忍，心情十分苦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年逾古稀的杨素苗老人的艺术之花重新复苏，焕发了青春。在县、乡领导的鼓舞下，重新拿起剪刀，从事自己喜爱的剪纸艺术。她的代表作品《龙凤呈祥》、《丹凤朝阳》及《窗花》等十几幅剪纸作品，构图新颖，线条清晰，栩栩如生。1981年在省会石家庄市展出时，被省美协评为佳作，并被选送首都北京展出，受到知名人士的好评。其中有十二幅被选送日本展出，受到日本美术界人士的赞誉。为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1984年我省农民赴日考察团带着杨素苗的十三幅作品，赠送给日本友人。杨素苗老人在八十年代改革热潮中焕发了青春的精神面貌。

杨素苗的艺术作品，不仅为我县、我省争了光，同时还为中日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为中日友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在她在县、乡两级政府的关怀和鼓舞下，本着创新多作发挥剪纸艺术的精神，把晚年有限的时光，献给剪纸事业。

在她的亲手传授下，其长孙女王兆芬的剪纸技艺已达到

相当水平。栾城县文化馆长李玉多次登门求教。赞皇县的李爱菊，为了提高剪纸技巧，也慕名远道来到杨家，拜杨素苗为师，多次住在她家，潜心学习。对此，她都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她高兴地说：“我为着剪纸艺术后继有人，感到欣慰。”

作者：杨德普，中共党员，曾任无极县甄村艺术学校校长。现任无极县甄村学区业教干部。

附 剪纸作品一幅



龙 凤 呈 祥

“七七”事变前 无极县的教育概况

陈承德

清朝末年，清廷内部没有单独的教育行政组织，教育由礼部兼管。礼部主要是管五礼的，对于教育，只管科举一事。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后，由于受西洋文化教育的影响，学堂教育有所萌发，清廷开始设管学大臣一员；省设提督学政一员；道、府、州、县仍无相应专人管理。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开始形成比较完备的教育行政体系：清廷设学部，位在礼部之上，省于次年裁撤提督学政，另设提学使司；县设劝学所，由总董负责；县下设学区，每区设劝学员一人。

一九一二年成立中华民国，教育行政管理上，改清朝学部为教育部；省级改提学使司为教育司。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改为教育厅；县级仍为劝学所。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县改劝学所为教育局。无极县教育局于同年八月成立，省厅委李荫清为首任局长。

自从“百日维新”以后，废止科举，兴办学堂。自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至民国成立，我县共建初等小学堂四十一所，在校学生达一千八百五十二人。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发生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两

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我县的学校教育事业，才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势头，各村初级小学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这时民间流行着一句谚语：“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寺庙修学堂。”据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调查全县的人口情况是一百八十四个村，三万四千六百五十九户，一十六万九千七百七十二人，其中男九万四千一百一十九人，女七万五千六百五十三人，学龄儿童二万九千〇三十人。自民国初年到“七七”事变前，共建初级小学一百六十二所，连同清末原建四十一所，共建二百〇三所。其中男校一百四十六所，女校五十六所；男女合校一所（学生五十八人）。在校学生六千八百五十七人，其中男生五千一百六十八人，女生一千六百三十一人。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王桂照县长热心教育，亲自下乡，逐校视察，并督令彭家庄等村创建短期小学十六所，招生六百四十人。至此，全县各村都有了初小，共计二百一十九所，共有小学生七千四百九十七人，入学率达到25.8%。

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虽然为了争夺地盘，进行混战，不肯拿出多少钱办教育。但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我县的教育事业，尽管发展缓慢，但比封建统治时期毕竟是加快了步伐。

这个时期的初级小学均为春季始业，学制四年。课程设置有国语、算术、图画、手工、音乐、体操；二、四年级增开自然、社会两科。全国没有部颁统一教材，流行着商务、中华、北新等几种版本，都是经教育部审定过的，由各地教师自由选择使用。短期小学学制二年，春季始业，只开主课。由于那时学生入学率低，学校规模很小，绝大多数学校

实行复式教学。

随着初级小学的逐渐建立，毕业生越来越多，高级小学也相继建立。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建城内高小；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建里尚高小；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建南池阳高小；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建张段固高小；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建城内女子高小；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建西南汪高小；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建郭庄、北苏、西汉三所高小。至此，全县共有高小九所，其中男高七所，女高一所，男女合校高小一所。共招六十二个班，其中男生六十个班，女子及男女合校各一个班。共有学生一千九百五十九人，其中男生一千八百二十八人，女生一百三十一人。学校轨制：单轨七所，双轨两所。学制均为三年；秋、春季始业不等。课程设置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图画，手工、体操、音乐、公民、外语等十一科。

全县小学校普遍建立，需要大量师资，因而师范教育也逐渐得到发展。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成立师范讲习所，招生二班，学生一百人，学制半年。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将师范讲习所改为单级教员讲习所，招生二班，学生一百人，学制一年。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停办。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成立单级师范讲习所，招生一班，学生五十人，学制二年。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改单级师范讲习所为职业教员养成所，招生一班，学生五十人，学制四年。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奉教育厅令，将职业教员养成所改建为乡村师范学校，耿之光县长重视师资培育，遂将校址由东门里路南（现食品公司）迁往文庙。（现无极中

学)继任县长张德新对乡师建筑尤其热心,将大成殿改为大礼堂,修整东西两廂为学生宿舍,并新建教室七楹,教职员宿舍九间,食堂四间,委任张成美为校长,招收现任或曾任小学教员者进行培训。学生两班,共一百人,学制一年。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高士瑜接充校长,发现本县男师资过剩,女师资不敷,经呈准教育厅,停招男生,改招女生,并改名为女子师范学校,先后共招女生两班,计一百人,学制三年。以上各期所、校、均称简易师范。由于学制长短不一,教学内容分量各异。除文化课外,专业课一般均开小学课程标准(相当现在的教学大纲)、小学各科教授法、儿童心理、学记、识谱弹琴等科。

清末民初,社会教育也有所发展。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劝学所内设讲演员二人,向民众进行时局、文化、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等教育。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讲演员改称宣讲员,增至四人。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奉教育厅令,成立宣讲所,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改为教育局宣讲所,委成炳麟为主任。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改称正俗宣讲所。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改称通俗讲演所。以上各期宣讲所均附设于教育局内。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讲演所与教育局分离,单独设立,所址迁往关岳庙(今棉织厂外东北角处),主任是张纯怀。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耿之光县长令将所址迁往南大寺(今邮电局家属院),重葺房舍,作为永久地址。并将体育场、图书馆与讲演所合并,改建为民众教育馆。委万砚田为馆长,聘王书林、赵萝梅为主任。内分图书、展览、卫生、讲演四部。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内部组织进行调整,设生计、教

导、阅览、健康、事务等五组。以上各期馆所、可通过巡回讲演、书报借阅、实物展览等形式，向民众灌输民主思想、文化启蒙、农业生产、卫生保健等通俗知识，俾使提高民众觉悟，改善社会风尚。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我县旧教育即毁于日寇的炮火和铁蹄之下。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中共晋无县委和中共晋深极县委的领导下，我县逐步开展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日

作者：陈承德，曾任无极县教育局副局长，现已退第二线。

无极县工商联会史话

刘宗诚

无极县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五三年秋季，它是工商界的人民团体组织，主要由过去从事工商业的人员组成，同时吸收了一部分国营、集体企业、合作社联合社以及和工商联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会员。受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定局级单位，经费由财政开支。机关编制五人，其中主任委员李焕章，副主任委员许春山，（属资方代表人员）设秘书、干事各一人，常年驻会处理日常工作，与县政协同院办公。地点在现在的保险公司处。

通过座谈回忆，已弄清建国初期我只有私营工商业者一千四百人左右，大多数分布在无极城内和郭庄、北苏、高头、张段固、七汲、大陈、南流等乡镇，主要从事棉布、百货、杂货、饮食、修理、服务五类行业。经营规模上，不仅没有现代化工业，连小手工业作坊（为，印染、食品加工、榨油）的基础也很薄弱，没有单纯的批发商和较大的零售商，也没有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或以零售为主批发为辅的兼营商。因而在我县没有形成资本家和小业主，只有独自经营的家庭坐商和流动小摊贩。属下层小资产阶级范畴。仅县城内就有公兴银号，德兴合杂货店、义和昌棉布庄、永和饭馆等店铺一百余家，另外各种摊贩无计其数。郭庄镇是县西北的商业经济中心，也有大大小小的店铺百余家。在满足人民生活日用

品需求方面，各自发挥了主要作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有的转业改行，有的外出谋生，有的年事已高，停业歇息，因而从业人员明显减少。

一九五三年，无极县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因势利导地带领私营工商业者在三年里迈出了三大步：

第一步，一九五四年，坚持自愿原则，将全县私营工商业者分期分批、按行按业地组成了三百多个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小组。这种合作小组，主要经办替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销、代销业务，有的在经销、代销以外自营一部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没有经营的商品。商业部门在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商店中指定一个商店，作为合作小组的批发店，具体任务：一是给合作小组供应商品，寻找货源，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二是协助合作小组向银行贷款，解决资金困难问题；三是负责汇集合作小组应交的税款，代向税局交纳。这种经过批发店领导合作小组的形式，既照顾了群众消费的方便，又保持了私方经营积极性，使他们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领取计件工作性质的代购代销的手续费，获得适当收入，同社会主义经济有机地联系起来，为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第二步，一九五五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我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生了新的变化，有关部门通过调整、整顿，按行业将三百多个合作小组合并成一百多个合作商店。合作商店接受国营商业的领导和监督，店内实行民主管理，经理、副经理和组长均由公众选举产生，不脱产，待遇与普通成员相同。合作商店执行“四马分肥”的办法